

## 主持人语

---

张 沛

《论语·微子》记载：

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……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耕而不辍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怃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蓑。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”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至则行矣。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

孔子以为“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，（天下无道时）“不仕无义”，隐者“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”，此即亚里士多德所谓“人是城邦的动物”（《政治学》1253a）之意。古希腊语“城邦”（polis）原指人类由家庭、家族、聚族同居的村社（demos）而最后形成的生活共同体，此共同体指向人的“至善”（αριστον），即人之所以为人的“自然”，因此也是人的根本—最佳生活方式，即孔子所谓“（仁）道—大伦”：在此之外，无

非“鸟兽”之类；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，那就是“自外于城邦者，非神即兽”（《政治学》1253a）。

希腊人说的“城邦”，罗马人亦称为“共和”（*res publica*）。如西塞罗所说（他的观点源于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以及波里比阿）：共和城邦是一个民族的“共同产业”（《论共和》1.39& 48），而这“产业”（*res*）既是物质的，如土地，也是精神的，如“德性”（5.8）。于是城邦——即人类群居之道，或者说共和政制——有义利之辩。说城邦以义合（所谓 *summum bonum*）或以利合（所谓 *commonwealth*），事实上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人类为什么需要城邦（政治）？目标未必生成动力，而动力并不等于能力。因此，真正的问题倒是在于：人类何以是——因何能成为“城邦与政治的动物”？

有人（例如柏拉图）的答案是“生存需要”：个人无法独自生存而不得不互助合作（《理想国》369b）。然而，通过劫掠（如独脚大盗）亦可维持生活而不必组成城邦。人之所以成为“城邦-政治动物”，除了生存需要，更有“爱欲”（*eros*）的原因。城邦以家庭为基础，而家庭肇端于夫妇；有夫妇而后有父子，有父子而后有手足（如荷蓀丈人之“二子”）。将此天伦（性欲—亲情）推己及人，乃有友爱之共同体（如长沮、桀溺之“耦而耕”），由眷属、乡党、宗社、部族以至于城邦、联邦和世界（用中国古人的话说，就是“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”）。

因此，城邦是爱欲的产物。然则爱欲从何而来？说爱欲来自爱欲之神（赫西俄德：《神谱》120；卢克莱修：《物性论》5.962），这种“机关降神”（*deus ex machina*）的回答并无多大意义。柏拉图的《会饮篇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分析视角和解释框架：如其所说，爱欲或是关于肉体—世俗的欲望，或是精神—灵性的追求（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所谓 *cupiditas* 与 *caritas*），本质上是同性（质）之间的吸引，即局限于肉体—此世欲望的灵魂或现实自我对理想自我（真实世界—永恒理性）的企慕，以及由此产生的（重新）结合为一体的意向和努力。这其实是一种生殖冲动，即人类个体向往与显现为“美”的真实—存在（这是他的同类，或者说本来之我）发生关系（这是哲学即“爱智”的事业）孕育精神后裔而使自身永恒不朽的欲望。<sup>[1]</sup>

我们发现，哲人所说的爱欲（确切说是对智慧的爱欲，即“爱智”）超越了城邦—政治生活。的确，爱欲不足有损城邦—政治生活，如第欧根尼（*Diogenes*）、泰门（*Timon of Athens*）等人所为，但爱欲过盛同样会伤害城邦：安提格涅（*Antigone*）对天伦的

[1] 我们发现，柏拉图在这里使用了“（女性）受孕”意象而非后世哲人（如费希特、德里达）所说的“播种—射精”隐喻。与霍布斯—反古典“爱欲”政治哲学而以“恐惧”论证城邦缘起或“国家理由”一样，此亦古今思想差异的话语例证之一。

爱欲、克里奥兰纳斯 (Coriolanus) 对自身功名的爱欲、恺撒对帝国一权力的爱欲乃至哲人对智慧一德性的爱欲，均可作如是观。尤其是后者：从苏格拉底到亚西比德 (Alcibiades)，正如从尼采到希特勒，不过一步之遥，但在一念之间。爱一己之所欲，还是爱一己之所属？这是分水岭，也是试金石：后者需要节制 (sophrosyne)、奉献乃至牺牲，而前者往往导致狂妄一僭越 (hybris)、征服的意志与“存在的冒险”。哲学作为最高和最强烈的爱欲，必须自我克制而隐忍退藏。“退藏”并非消极处世，更非游戏人生；相反，它是一种为城邦一政治生活负责的态度，一种静默的担待一付出，或者说更加深沉的爱欲。如此行事者，即为爱城邦的哲人或爱智的城邦人 (political philosopher)；即便他被视为消极甚至无用或者可笑，也会无动于心而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，在大荒之中（或有二三同道，亦未可知）行进：这是他的命运，也是他的使命。